

“西南夷”是《史记》等文献对中国西南地区土著居民的概称。“西南夷”约在距今3700年前随着西南青铜时代的开启，由氏族部落转化而成，在春秋、战国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随着西汉中央政权在“西南夷”地区统治的确立，“西南夷”开始衰落，并在两汉之交蜕化为“南中大姓”与夷帅控制下的新的族群[1]。在这种新的族群中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丧葬形制——“梁堆”墓。

梁堆是云南昭通地区的土语，指地面隆起的“似冢而大”的封土堆。因人们不知道分布于地表的巨大土堆是古墓葬，当地老百姓称之为“粮堆”、“大堆子”、“烟堆子”、“梁王堆”等，故对此还有不少神奇的传说。如《昭通县志稿》说：“梁王堆，昭城四乡皆有，似冢而大。传说古时有夷名马湖子据此，择高阜处凿岁以掩死者。每至清明日，其婿轮流垒土以为尽礼，接年如是，遂积成堆。”雍正《云南通志》也说：“粮堆在城东(宣威州)二里，世传武侯南征，至此乏粮，堆土覆于米上，以示有余。今遗址尚存。”[2]此外，有人认为原为徭人葬地，也有人认为“徭堆”应该为“窑堆”，因为土堆形如瓦窑之故。还有人认为古代烽火报警之土台名叫“狼墩”，“狼堆”即“狼墩”之意[3]。这些记载和认识，都给“梁堆”带来了很多误解。

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，“梁堆”的性质才被慢慢揭开。所谓“梁堆”，实为西汉末至唐初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，其鼎盛期为汉晋时期。后来的田野考古学也就借用“梁堆”这个词汇，专指封土堆下的墓葬。云南地区发现“梁堆”墓最多的地方是滇东北及滇中区域。卫聚贤、张希鲁等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云南昭通发掘的后海子“梁堆”墓，并对周边的刘家包包、曹家包包、洒渔河等“梁堆”进行的调查，是云南地区开展“梁堆”相关工作的开端[4]。此后，经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，不断地对此类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，人们才弄清了它的基本性质和年代。

这种封土堆墓，其特点为地面有巨大的封土堆，封土以下为墓室，有的甚至还有墓道。一般一个“梁堆”下为一室，也有的为两个或两个以上，与中原地区的“衬葬”习俗有些相似[5]。墓葬多座落在平地或附近的山丘上，多以墓群的形式存在，一般三五成群，高出地面数米或十余米。封土土质细腻，部分似经筛选而后夯筑，直径十余米者居多，最大的三十余米。墓葬墓室有土坑的、砖室的、石室的等，砖室的居多。砖室的基部或砌石块，有墓道，单室、双室或附耳室，券顶或四角攒尖顶。墓砖上有菱形、方格形等几何纹饰及画像等。墓砖上有的还刻有纪年铭文或者绘有壁画，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是其中的代表。葬具常用石棺，棺上雕有画像，内容有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有的还有蛇尾人身、楼阁、武士等。除石棺外，可能还有木棺，虽已腐朽不存，但铁钉、漆皮等时有发现。孙太初先生曾对“梁堆”墓进行过专门论述，将墓葬形制大致分为三型：一型基本结构为长方形，多为单室，少为前后室，前面有短小墓道，顶部用楔形砖砌作半圆形券顶；二型墓室长方形，有双室并列、前后室两种，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，前面有短小墓道；三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，前面有短小墓道，覆斗形顶，墓室用石块砌造[6]。上述对墓葬形制的分类，基本囊括了已发现的“梁堆”墓的各种类型。随葬品常见的有生活用具，铜器有洗、盘、釜、甑、釜、钟、提梁壶、鏃斗、灯、案、耳杯等；陶器除了罐、碗、盘等容器外，还有灶、牛、鸡、等模型和各种人物俑；兵器有铁剑、环首铁刀、铜弩机、铁簇；装饰品有金发针、银戒指、银镯、铜带钩及车马饰等。墓葬的随葬品总的来讲，体现出了汉文化影响的痕迹。

“梁堆”墓的年代一般比较明确，因为很多墓室中有纪年文字，部分“梁堆”墓前还立有墓碑，这些为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。昭通出土的“朱提堂狼洗”的铸造年代在东汉中期，出土的铜镜等物也多为汉晋风格，货币有五铢，王莽时期的货泉、货布、大泉五十等，蜀汉时期的“直百五铢”及剪轮五铢等。此外，出土于昭通白泥井“梁堆”墓前的“孟孝琚碑”，是云南境内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碑刻，其年代就是东汉年间的。再加上曲靖、呈贡、姚安等地多座纪年墓的发现，证明这类墓葬延续时间较长，从东汉至南北朝，部分可能晚到唐初，

盛行于汉晋时期。

“梁堆”墓其产生的背景与中原王朝在此地的经营是分不开的。文章开头提到的“西南夷”本是土著居民，但自汉武帝在此设县置郡经营“西南夷”以后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汉族移民的数量日渐增多，导致了“西南夷”地区民族情况与文化风貌的蜕变。特别是五尺道、南夷道、零关道等古道的开通，极大地加快了汉文化及其汉族移民的进入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先进技术的传入，特别是铁器的传入和使用，促进了牛耕的兴起和水田的开辟，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。逐渐地汉文化及其影响在云南各主要坝区和交通要冲广泛而明显，云南地区在文化上也失去了原有的地方色彩，具有和内地相同的文化面貌。在此基础上，云南的地方割据实际形成，史料中记载占据一方的“南中大姓”就是其中的代表[7]。“南中大姓”是西汉后期至魏晋时期由内地迁往云南的汉族移民上层，是在南中汉族移民社会中孕育产生出来的，其形成和发展与南中移民区内部汉族传统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环境的长期保持和延续息息相关[8]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列举了“南中大姓”共有八个，即“焦、雍、娄、爨、孟、量、毛、李”。文献记载谈到南中地区的居民时，常用“夷汉”、“夷晋”（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）“戎晋”（爨宝子碑）或“宋夷”（爨龙颜碑）来概括之。“南中大姓”是汉人、晋人或宋人的混合，而不再是单纯的夷人了[9]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所记的“夷汉部曲”、“霍家部曲”，便是南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互相融合的真实写照了[10]。现已发现的“梁堆”的墓主人有姓可考者，也大多与上述记载的相符。如1972年昭通二坪寨“梁堆”出土的印章，文曰“孟滕之印”。1973年昭通出土一套子母印，凡三枚，文曰“孟琴之印”、“孟琴”、“伯称”[11]。著名的孟孝琚碑，亦出土于昭通的白泥井“梁堆”墓，墓主人就是“南中大姓”中的霍家。因而，“梁堆”墓即是这些有着浓厚汉文化背景的“南中大姓”的墓葬无疑了。

“梁堆”墓是汉晋时期广泛分布于“西南夷”地区的一种特有的墓葬，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、形制、起坟立碑习俗等各种角度来看，都体现出了一种汉夷文化的融合，是西南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，也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见证。当前，加强“梁堆”墓的保护和研究，对探索汉代以来对西南边疆的经营、西南地区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、“西南夷”地区民族演变以及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开辟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[1]秦树才、高颖：《西南民族形成问题探究：以“西南夷”为中心》，《思想战线》2018年第2期第44卷。

[2]张增琪：《古代云南的梁堆墓及族属新探》，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》1989年第4期。

[3]汪宁生：《云南考古（增订版）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。

[4]刘斌、张婷：《卫聚贤、张希鲁与云南首次考古发掘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6年第1期。

[5]韩国河：《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》，《考古》1999年第10期。

[6]孙太初：《云南“梁堆”墓之研究》，《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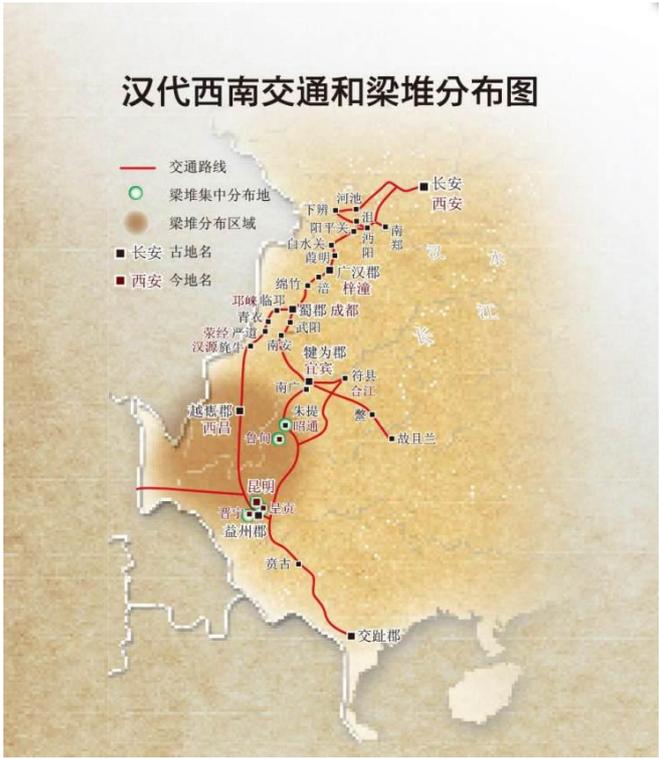
[7]杨帆、万杨、胡长城：《云南考古（1979—2009）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。

[8]尹建东：《东汉魏晋时期巴蜀豪族与南中大姓发展差异之比较》，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13年5月第3期。

[9]同[3]

[10]佟柱臣：《从考古学物质上观察中华民族融合的痕迹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（历史学）》1985年第2期。

[11]同[3]



汉代西南交通与梁堆分布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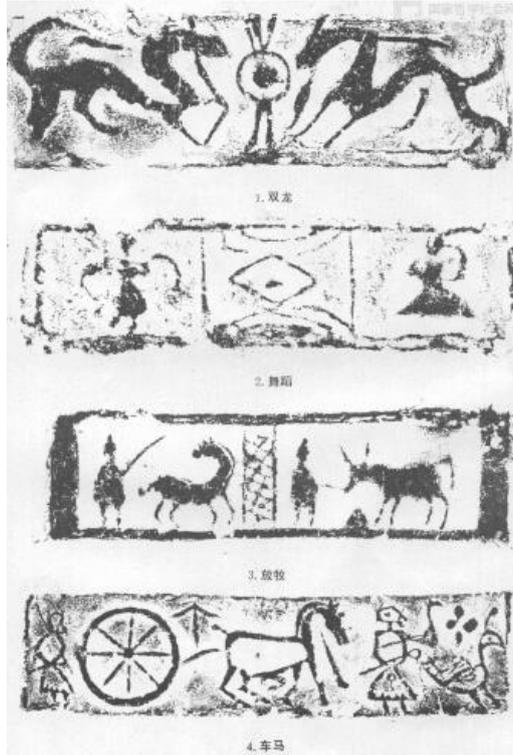
昭通坝区分布的梁堆墓群



昭通甘河湾子梁堆墓（两座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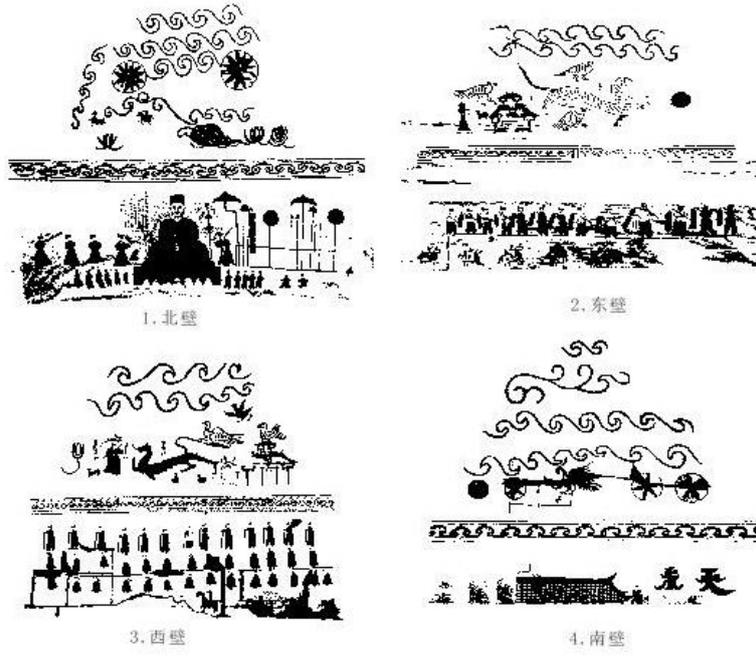
昭通大凹里梁堆墓



梁堆墓的画像砖



昭通桂家院子梁堆墓”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“铭文



昭通后海子东晋梁堆墓壁画



昭通二坪寨梁堆墓出土的印章



”建初元年”朱提造铜洗